信仰与宗教

传教士 公正舆论 教案
——由义和团时期的卫礼贤所想到的

苏位智

［摘要］卫礼贤是19世纪90年代由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他在义和团时期表现出与西方众多传教士绝然不同的理念和行动；他对义和团缘起必然性及其斗争正义性的公允理解和支持在当时德国的舆论界并不是孤立的；由此引出对中国近代史上长达100多年反教会斗争最本质原因的新思考。

［关键词］卫礼贤 传教士 公正舆论 教案
［中图分类号］K25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3）-02-0089-06

Missionary, Righteous Public Opinion, and Anti-missionary Incidents: Richard Wilhelm's View of the Boxers

Richard Wilhelm was a Germ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sent to China by the 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1890s. Unlike other western missionaries of that time, he understoo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rise of the Boxer movement and thought it a righteous uprising.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Boxers was not an isolated one in German public opinion, which causes the author to reassess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anti-missionary struggle that persisted for over 100 years.

发生于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是20世纪第一年的震撼世界的大事件[①]。由于意识形态、政治信仰、国际关系等历史因素以及语言、资料等工具因素的影响，100多年来对此事件及其相关历史现象的评价，无论在国际论坛还是某一国度的学术界，都没有达到统一的认识，有些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历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各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卫礼贤在义和团时期言行事迹的分析，引伸出对该时期莫衷一是的传教士、公正舆论和教案诸问题的点滴新认识。

一、与众不同的传教士

19世纪是天主教和新教大兴海外传教的时期，而新教徒的传教活动“大部分来自英国和美国”，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新教徒高度集中在这两个国家。同样地，也由于工业革命给英语的世界带来了空前的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②]。面对这次传教热潮，“德国的一些新教徒团体也纷纷响应，并且积极行动起来。特别是在80年代德意志帝国步入欧洲殖民列强的行列之后，德国新教的海外传教获得了长足

［收稿日期］2002-10-15
［作者简介］苏位智（1949—），男，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济南250100

发展”[3]。1899 年 5 月，年仅 26 岁，加入德国新教传教组织——同善会刚刚 4 个月的卫礼贤被派遣到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本营——青岛传教。

19 世纪最后 40 年，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到中国的传教组织都迅速扩大。到 1900 年，天主教在华的欧洲神甫达到 886 名[4]；而新教的在华传教士到 1905 年上升到 3445 名[5]。如此众多的传教士在中国经营了 100 年，并未取得自己满意的传教效果，反而引起了中国民众“最大的恐惧和仇恨”[6]，致使反基督教的冲突连绵不绝。不过也有极少数的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可，卫礼贤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是什么原因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效果呢？笔者认为，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卫礼贤公正的是非观念和与欧美众多传教士不同的传教理念。

首先，卫礼贤能公允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既肯定该运动爆发的必然性和正义性，又批评其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义和团运动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无疑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爱国运动。这是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在 100 年前，一般西方人却对它怀着极大的偏见，将懒惰、狡猾、残暴等恶名通通加到中国人的头上。而卫礼贤在当时就指出这场运动的爆发是必然的。他指出：“当纷争四起、坚船利炮开始出现、强取豪夺不断的时候，中国人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帮凶的压迫。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盗夺走的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7]

由于对义和团的缘起有科学的认识，对其斗争的正义性自然有所理解。他为义和团正名：“义和团这个词被外国人错译为 Boxer（拳击者），这便使不明真象的人们误以为它仅仅是一个施用暴力的集团。事实上这个名称应被译为：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peace（保卫公共和平的团体）。就是说，义和团的行动远远不止是拳击式的暴力进攻，其更重要的含义乃是为和平自卫。”[8]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振奋”[9]。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传教士，卫礼贤能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对其爆发的必然性和运动的正义性抱有上述态度，实属难能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在当时还能对义和团所表现出的盲目排外局限性既提出批评，又给予理解；同时对八国联军的暴行也进行抨击。他指出，中国人痛恨那些将自己的自由之邦变为受制于他国的入侵者们，出于报复心理，他们便视所有的外国人为仇敌，甚至到了从肉体上加害于外国人的地步。同时他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基于一种真实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当仇恨和残忍的冲动一起释放出来时，残酷是无法避免的……如果和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笔者）相比，义和团时期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卫氏还指出：“得胜的各国联军似乎是为了显示所谓‘文明国家’的粗鲁和残忍而来的，而且这种粗鲁和残忍一点儿也不比外国人谴责的中国人差。”[10]

其次，卫礼贤敢于义无反顾地谴责德国侵略军的屠杀暴行并能以实际行动去化解由此而产生的灾难。1897 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租了山东胶州湾，自此以后，因传教士及筑路开矿诸事，不断遭到兰山、日照、即墨、高密等地民众的反抗。对于此类事件，天主教会的安治泰、薛田资等传教士均努力请求并热衷支持德国军方以武力威胁和镇压。卫礼贤来青岛不久，适逢德军又派遣所谓讨伐部队前往高密镇压那里的抗德斗争，“当军队到达高密县的一个村，一进村便威胁性地对其开火，受到惊吓的妇女和儿童们仓皇地向村外逃跑，德国侵略军看到这些妇女们穿着红裤子，如同义和团员们的穿着一样，于是便开枪向她们扫射”[11]。卫礼贤得悉后非常震惊，认为“此事纯系双方的误解——德国人尚不了解中国农民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粗暴地施用了武力”。他不顾别人的劝阻，亲自跑到现场，试图“努力调解误会”[12]。

高密民众不屈服于德军的暴行，继续组织抗德行动，德驻青岛部队准备再次赴高密镇压。卫氏闻讯后，一方面尽很大努力说服德军先遣队推迟出发时间，一方面赶去见当地的中国官员，说明事情的原委，解释发生冲突的严重后果。[13]由于卫氏的周旋，一场即将发生的流血惨案避免了。事后，他又将该地区所有村庄的代表召集到一起，以他个人的名义向村首

们担保说，今后将尽自己的努力，不使这类事情再次发生。[14]当地民众看到了一位与依恃武力耀武扬威的德国侵略军大不相同的德国人。

卫礼贤的义举受到清政府的赏封，成了一位洋道台和胶东地区有名的“卫大人”。

再次，卫礼贤坚持独到的传教思想。其一，他不赞成使用武力来维持教会工作。他说，他之所以投身于耶稣教，到中国来当牧师，“并不是为了要劝说多少中国人入教受洗，而是想为中国人切实尽力”。他认为，“宗教纯为不可遏抑之仁爱之表现耳”，传教士只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树立民众威望，赢得崇敬，而绝不应依靠武力和压制横行霸道。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天主教和其他教会团体狂热地向中国政府和民众索取对所谓被害传教士和被毁教堂的赔偿，卫氏却反对说：“教会必须自己承担费用和风险”，以免由于国家（指德国）持报复手段而加剧中国人对教会的仇恨情绪。[15]

其二，卫氏主张教会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国情相适应。他认为，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涵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使用强力方式让中国人接受新宗教而放弃传统文化很容易引发冲突，此乃以往传教工作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中国传播福音教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主张传教士们最好还是先从办学和行医等文化工作开始，逐步为传播基督教义创造条件。[16]

其三，卫氏主张传教士的传教动机和教徒的入教动机均须端正。他认为，某些传教士以其通晓汉语能够与中国人联系和打交道的条件，来为某些工业巨头和大资本商建立商业与经贸联系，是极不正当的。他对某些只是到了触犯法律、处于诉讼窘境才打算入会，但又拿不定主意入何教会势力会更牢靠之人的入教动机颇感失望。他认为，这种抱着报复心及其种种不正当目的的入会教徒和以为拥有特权会使教会变得伟大起来的传教士，绝对不能给中国人和传教士带来和平。教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教徒向地方官府施加压力，而地方官则被迫让百姓们维护教会，结果愤怒的中国百姓便起而捣毁教堂或击杀传教士以示反抗。而外国人再为此外交施压和大动干戈，一切灾难便将由此产生。他指出，一个教堂在文化国度中只能凭威望而存在，而不能在一片谴责声中存在下去[17]。

二、绝非孤立的公正舆论

100 年前，卫礼贤对义和团缘起必然性及其斗争正义性的公允理解和认识，在来华传教士中是极为少见的，然而放眼全球则绝非孤立。[18]本文仅限德国之范围，亦足见当时对义和团公正舆论之广泛。

（一）对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的正义谴责

德国人民一贯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反对侵略中国的政策。对 1897 年德皇威廉二世的“铁拳”学说和强占胶州湾的侵略行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都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1897 年 12 月 21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梅林针对“铁拳”学说严正驳斥德国侵略者的所谓帝国的权力就是海外权力的谬论。1898 年 1 月 12 日，弗·梅林指出，德国政府的目的是要“瓜分中国”；胶澳租借条约“将对民族提出新的生命和财产的要求”，掠夺胶州湾绝对不能给德国人民带来任何好处。[19]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倍倍尔也多次抨击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1898 年 2 月 3 日，他在帝国国会上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提出抗议，指出“租借胶州湾是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号召德国人民必须对德国侵略政策进行坚决斗争。4 月 27 日，他又痛斥了外长布洛夫所谓占领胶州是德国特别爱好和平的无耻谰言，指出德国奉行的侵略政策必将给德国人民带来无限的困窘，并断言“我们在那里（指胶州湾——笔者）的一切都会丧失殆尽”。[20]德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领袖威·李卜克内西指出，德国政府以保护公民和贸易为名，声称“租借胶州”，而“根本不打算归还这块地方”，实际上“这是利用媾和进行侵略”。他强调，“有人在欺骗德意志人民”，企图“通过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方式转移人民对国内贫困不满的视线”。他号召德国人民对德国现行的政策，特别是殖民政策和侵略政策予以强烈反对。[21]

听罢社会民主党人的言论，我们再看看普

遍民众的反应。1898 年 1 月 21 日《北华捷报》转载了《东亚劳埃德报》的一篇报导，此文典型地表露出众多德国人民的立场和反侵略的思想情绪。作者奥格勒认为，德国侵占胶州湾是非常愚蠢的，现在德国人已踏入了列强竞争的场地，并从一个善良和以纯朴著称的民族那里占领土地，德国绝不应以它杀死了几个传教士而向其下毒手；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巴伐利亚被杀害，中国舰队突然包围了慕尼黑或威廉港，我们对此说什么呢？德国侵占中国的真正原因是贪婪，这种公开破坏国际和平的做法是不会被中国人长久容忍的！

（二）对义和团运动的理解和支持

1900 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全世界的舆论热点。德国社会各界及时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给予充分理解和坚决支持。运动刚刚爆发，弗·梅林就说："有时候内美斯女神（即报应之神——笔者）的步子还是蛮快的：舰队基地的获得，以及那些关于霸权政治的鼓噪，已引起了中国的反响，那里及时地爆发了骚乱"。[22]1900 年 6 月 19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以《铁拳》为题的社论，它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前宣布的对中国'铁拳'政策引起的。"社论最后说，"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柏林民报》说："查闹事之由，自德国占据胶州始。德国首先并吞中国地方，俄英随之……犹忆德皇前在基尔地方说，同中国办事，须用铁甲拳头，其意须以兵力治之，当时大众不以为然，今请观以铁甲拳头办事究竟如何？国家（指德国——笔者）甚愿侵占中国土地，有伤中国体面，以至刻下生出许多事来。""现在中国之事，可见中国人决不甘心各国瓜分……外国人至中国，无非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此系中国神人共愤之事。"[23]又有《孚斯报》说："六十年前，欧洲以强力逼中国通商。至四十年前，教士陆续至东方，分布各处……六年前，又强迫中国建造铁路，又纷纷传说瓜分中国，欧人之逼迫中国如此，华人所以亟思自强以与欧人抗也。"[24]

（三）对德皇"匈奴演说"的抨击和批评

1900 年 7 月 27 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即将来华的侵略军送行时发表了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味的"匈奴演说"。当即遭到德国朝野各党派的激烈抨击和批评。在威廉二世发表"匈奴演说"的第二天，社民党领袖威·李卜克内西在德累斯顿工人群众集会上，愤怒地谴责德国和列强武装侵略中国。他说，德意志帝国的所谓世界政策是罪大恶极、软弱无力的。他号召各国人民应当起来反对这种国际掠夺。他坚信，中国的革命"意味着世界的大转折"。[25]9 月 18 日，德国社民党主席保尔·辛格在该党美因茨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指出德国的对华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完全是为了满足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文主义的领土欲望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益。[26]在此后的几个月中，社民党人克·蔡特金、奥·倍倍尔、保尔·辛格等还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反对德国推行铁拳世界政策，反对侵略中国。

对德皇演说的反响涉及到相当大的范围，但是无论是自由派、保守派还是教会方面的报纸，或多或少地、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了"匈奴演说"。[27]

"匈奴演说"对德国在外国形象的影响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威廉使用的"匈奴人"几年以后成了流行语，尤其是在英国，它至今还被用来描绘德国这样一个好战的民族。今天的德国人也将它视为历史上的民族耻辱，"它把无情的复仇心和基督教圣战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是对德国傲慢的大国野心的生动描述。这是这位皇帝许多次鲁莽过份的演说中的一次。这些演说证明了他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不可捉摸的、横征暴敛的君主"。[28]

综上所述，可见当义和团运动奋起抗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包括卫礼贤在内的德国各阶层人民伸出同情之手，声援中国的正义斗争，严正谴责和反对包括德国军国主义在内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

三、教案与中西文化冲突

中国近代史上长达 100 多年的反教会斗争的起因问题，始终是中外学术界历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很多学者都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

角度来进行探讨。[29]笔者的观点是，中西文化冲突是基督教难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教案（或称反教会斗争）的终极或最本质的原因。这一点，可从卫礼贤的相关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卫礼贤认为，阻碍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并不是其教义的宗教性与当地宗教的不相容，而在于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采取如何使基督教尽快本土化的传教方法。

他回顾了基督教的传播历史，指出基督教与东方的佛教、儒教、道教等宗教并非不可共存。但是要想取得传教的成功，则必须将传教士所传宗教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与当地的宗教和传统文化加以融合，而且必须对不同阶层的人群采取不同的方法，其中尤以对受过教育并控制社会的上层开明人士的方法更为重要。卫礼贤指出，“考察一下成功的传教活动，他们总是根据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职业而采取措施”[30]。他认为，基督教早期传入欧洲和北非、17 世纪在中国的传播都是成功的例子。[31]他还看到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中国政府和外国基督教会都重新调整了传教政策和方法之后所出现的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新趋势。[32]

根据卫礼贤的分析，当 1840 年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之时，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制约，绝大多数的传教士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而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挑战，指责它的丑恶”，因此，“即使他胸怀世界上最美好的动机，仍不会得到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结果，他们首先吸引入教会的人便是无家可归者”[33]。这样的传教方法，使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凸现了出来，结果自然阻碍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但这并不一定会引致教案的发生。对于后者，卫礼贤也有精辟的分析。

卫礼贤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有多处对该问题的表述。他说：“与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广泛打交道的中国各阶层人士发现他们（指传教士 ——笔者）是一部宣传教育机器。美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并且为此不惜花巨资。美国的工业家和商业家对传教士非常重视，并且通过每一个传教士来发展商业联系。另一方面，美国传教团也不仅局限于进行政治、贸易和文化宣传。”[34]他又说，这个时期到中国的“传教士经常利用慈善的伪装，干涉当地正常的合法诉讼程序，他们的教徒也混水摸鱼。他们成功地扮演了受迫害基督教徒的形象，而实际上却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尽量地敲诈勒索。而教会却熟视无睹，在身后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国人的身份，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这种事情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他还说：“教会为了袒护他的教民不断向官府施加压力，用炮舰或其他外交手段相威胁，中国官府只得让步并为讨好教会而镇压百姓，最后积重难返，人民忍无可忍只好造反。他们焚烧教堂，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后来外国力量只得出面干涉，派遣炮舰执行处罚……所有的事又都重新开始。”[35]

对卫氏的以上表述进行归纳提炼，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1840 年以后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已超出宗教范围，它与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帝国主义对华扩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侵略政策结合在一起。此乃频频引发教案（或称反教会斗争）终极或最本质的原因。

关于这一结论，在排除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偏见和经过上百年的论争之后，已在许多严肃的学术著作中得到肯定。譬如，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研究专家路遥先生指出，“造成近代教案发生的根源乃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传教特权”[36]。美国著名学者周锡瑞（J ·Esherick）在他全面研究义和团起源的权威性专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专设了标题为“披着基督外衣的帝国主义”一章，认真研究了圣言会的德国天主教士们在 19 世纪 90 年代富有进攻性的发展教徒的策略所产生的影响。德国学者格伦德先生（H ·GrUnder）在其专著《基督教传教活动与德国帝国主义 1884 - 1914》的第四章，对圣言会传教士在山东的传教活动提出了更具批评性的看法。此类观点在各国学者的论著中均有反映，在此不一一赘述。

另一方面，卫礼贤对基督教的传播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教会的福音，还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数学、天文知识以及欧洲艺术和科技的新成果。与此同时，欧洲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启蒙时

期，不仅受到中国园林艺术、住宅艺术的影响，而且在微型艺术如内画壶、瓷器及道德、哲学等方面也受益匪浅。传教士们还通过翻译得到许多中国文化遗产。“这不仅使莱布尼兹认识到可以在中国欧洲的精神成果中进行综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的创始者也从中国的启示中总结出他们的主体思想，在这两种迥乎不同而又实力相当的文化交往中，一种新的文化开始发展。”㊲

很遗憾，“在一些年后，这种发展被迫中止了”。通过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接受欧洲人通商的条件。从此，“唯利是图的商品倾销铺天盖地”，随同鸦片一同涌进中国的传教士，也不再带来“智慧的信仰、文化和科学”。㊳

不过，卫礼贤坚信，“当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沟通后，一种理智和精神深处的交流就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至 20 世纪 20 年代，他便预见到“东西方的交流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而且他认为，这种交流所产生的影响，其“效果一定会是出人意料的”。㊴

毋庸置疑，身为传教士的卫礼贤在 19 和 20 世纪交替之际，面对复杂而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中西文化冲突表现出相当的高风亮节和远见卓识。但还应当指出，卫礼贤的最大贡献和思想精髓尚非在于此，他的最大成就是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卓有成效地进行中西文化的传播交流，并能“彻底地从传教士以至欧洲人的狭隘视界中解脱出来”，“而且以他的学识关注着人类的命运”。㊵辛亥革命后，清朝遗老集中青岛。他与康有为等过从甚密，组织孔教会——“尊孔文社”，推劳乃宣主其事。在这时期他在政治上与清朝遗老沆瀣一气，但他是从崇敬儒家思想尊孔读经出发，这同众多西方传教士所推行的殖民侵略奴化思想是有区别的。不过，这些内容已不在本文应涉及的时限之内，留待另文再述。

*本文是作者于 2002 年 6 月赴德国斯图加特参加“卫礼贤与中西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此处有删节。

①[英]哈罗德·伊文斯：《头条新闻》。转引自中国《参考消息》，1987 年 4 月 18 日第 3 版。

②④⑤⑥[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4 页；第 611 页；第 613 页；第 599 页。

③孙立新：《卫礼贤与东西文化交流》论文稿。

⑦卫礼贤：The Soul of China PP. 26 - 27. New York，1928；《中国心灵》，中译本，第 12 - 14 页，王宇洁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年 7 月版。

⑧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 46 页，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 年版。

⑨杨武能：《卫礼贤——“伟大的德意志中国人”》，载《人民日报》1990 年 2 月 22 日第 7 版。

⑩㉚㉛㉜㉝㉞㉟㊲㊳㊴卫礼贤：《中国心灵》，中译本，第 15 - 16 页；第 177—187 页；第 177—187 页；第 177—187 页；第 180 页；第 176、181 页；第 176、181 页；第 185—187 页；第 185—187 页；第 185—187 页。

⑪⑫⑬⑭卫礼贤：The Soul of China. PP. 31 - 32.

⑮《青岛最新消息报》(德文) 1906 年 4 月 24、28 日。

⑯⑰参见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第 62—63 页。

⑱关于义和团运动国际公正舆论的论文目录，可参见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 100 年》，齐鲁书社 2000 年 9 月版，第 467 页。

⑲[德]弗·梅林：《胶州》，载《梅林文集》第 14 卷。

⑳㉑参见《德意志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98 年，第 1988 页；第 1981—1986 页。

㉒[德]弗·梅林：《中国的骚乱》，载《梅林文集》第 14 卷。

㉓㉔翦伯赞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册)，第 239 页；第 240 页。

㉕[德]威·李卜克内西：《世界政策、中国动乱、德兰士瓦战争》，德累斯顿，德文版 1902 年，第 4 - 22 页。

㉖[德]保尔·辛格：《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载《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兹代表大会记录》1900 年，第 158 - 159 页。

㉗㉘[德]唐田慕：《黄祸？德国公众舆论与中国义和团运动》，载苏位智、刘天路主编的《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 1019 - 1022 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月版。

㉙参见赵树好文《建国以来反教会斗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第 224 - 226 页。

㊱路遥：《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载《山东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㊵[瑞士]荣格：《纪念卫礼贤》，载《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中译本)第 141 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年出版。